

GDUFS FORUM O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一)



策划: 刘建达 主编: 徐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NATIONAL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

(一)

策划：刘建达 主编：徐 海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 1/徐海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307-10325-2

I. ①广… II. ①徐… III. ①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①H0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264号

责任编辑: 陈泉吏 张 元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鑫泰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42千字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325-2/H.953 定价: 69.9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还看今朝

(代序)

桂诗春

这是首届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的论文结集。作为应用语言学在我国发展的见证人之一，忆往抚今，感受良多。

语言教学可说是古已有之，大凡有语言规范和语言变体的地方都会有语言教学（如古希腊使用 Attic 语作为正式语言，而民间则使用 Koine 语），我国孟子《滕文公》谈到楚大夫想让他儿子学齐语，问到是请齐人，还是请楚人来教他为好？而且还讨论到语言环境的重要，虽然齐人来教他，但“众楚人咻之，虽日挹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嶽（齐街里名）之间数年，虽日挹求其楚，亦不可得矣”。但把语言，特别是二语作为一种科学来对待则在战后。只有在各种现代科学的哺育下，才能兴旺发展。英美信息学和语言学家战争期间参与密码的研制和外语人才的培养激发了应用语言学的兴趣，经过一番酝酿，应用语言学踏入学术的殿堂。1964 年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发展的标志性的一年，国际英语语言学大会（AILA）在法国南希召开第一次大会，同年发表了英国 Halliday, Stevens, McIntosh 的《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和美国 Rivers 的《心理学家和外语教师》。前者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第一本教科书，后者为外语教学奠定了它的心理学基础。当时我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语言学资料》报道了 AILA 开会的消息。而《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一书也在国内影印出版。

可是其时正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我国外语教学痛失了 10 年和应用语言学保持同步发展的良机。1973 年，为了体现当时中英互换大使联合声明，我作为中国英语教师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英。出访前我们走访老前辈吕叔湘先生，他首先推荐我们看《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了解英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建议我们了解 Quick 当时做的英语用法调查有没有利用到计算机。不谋而合，我们到英后，英方安排了 Pit Corder, Stevens, Spicer, Alexander 等人向我们介绍应用语言学的新发展，包括参观和使用语言实验室、到实施中学语言教学改革（从文学转移到语用域，该项目的主持人是 Halliday）现场听课等等。

访英归来后,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应用语言学,在广外举办有英、美、加、澳等国专家主持的各种应用语言学培训班,招收硕士、博士生。1980年由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11省市22所高等院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等代表共45人。这是应用语言学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环顾与会的宿儒俊杰,我曾誉为“英语界五代同堂的盛会”,从川大的谢文炳教授算起,我们这一代只能忝居末代。1985年,由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the Chinese Context,简称ISTEC)在广外开幕,国内的正式和特邀代表48人,列席代表40余人,而来自英、美、澳、加和港澳地区的代表也有20余人,包括英国的P. Strevens, H. Widdowson, A. Davies, A. Maley, J. Utlely, 美国的G. Tucker, J. Atlatis, R. Bailey, W. Bright, B. Robinett, T. Rodgers, C. Paulston, 澳大利亚的M. Halliday, J. Platt, 加拿大的M. Swain, 港澳地区的B. Tsou, Cheung Yat-shing, Yu Fong-ying, Fu, Gail, van Naerseen, C. Macmillan, 因事未能参加而寄来论文的还有J. Richards。国内代表太多,难以一一枚举,仅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来了王佐良、许国璋、丁望道、胡文仲、沈树虹、David Crook和Isabel Crook。这可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记得Halliday和Strevens两人见面时,我也在场,他们说:“我们那次合作后便没有机会见面,想不到会在中国握手言欢!”1992年和2001年在天津和北京还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国际讨论会。2002年,我国正式参加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并于201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地举办第16届大会,共有来自世界63个国家的1500位专家、教师和研究者参加本届大会。与此同时还召开了第六届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我国终于克服“文革”所造成的种种干扰,最后融入应用语言学的大家庭,殊属不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领导和专家们居功至伟,值得称颂。

1985年的第一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后把部分论文结集成《中国英语教学》,共得33篇论文,其中22篇是我国代表写的,我们正好把它们和本论文集的37篇论文作一点比较。

1. 从论文内容上说,1985年的论文比较分散,从不同的角度(宏观的、语言全面观的、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文化的、语用的)来考察中国英语

教学，特别是对当时的英语教学的教学大纲设计提出种种思考。而本论文集则在几个问题上相对集中：语料库语言学、外语教学、词汇习得、语言测试、心理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及应用。这说明我国外语教师的视野趋向于更为专业化、更为深入和具体。具有勇于思考和探索的特点。

2. 从论文作者的角度看，1985年会议大都是我在前面指出的第五代，也就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代外语教师，而我们的老师辈（王佐良、许国璋）则仍在起着领军的作用，国外的专家虽然年龄上和我们相差无几，但在学问上则应该是我们的老师辈。这次文集的作者则大多数为第六代和第七代，其中也还有第五代的俊秀（如胡壮麟、冯志伟、杨惠中）起着承前启后的统领作用。两次会议都同样展示了学术上新尽火传的作用。

据说，广外应用语言学论坛还打算继续办下去。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英语学习者，英语教学理应是应用语言学舒展拳脚的一块好天地。实践出真知，我热切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学术活动，孕育出更多的新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代呼唤着更多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引领应用语言学的新潮流！

目 录

桂诗春先生的治学之道——贺诗春先生八十华诞

胡壮麟 001

高层论坛：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前景与资源共享

桂诗春 010

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与用途

冯志伟 012

语料库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与贡献

杨惠中 014

语料库的教学加工理念与应用

何安平 016

语料库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及外语教学服务

卫乃兴 018

语料库开发与语料库研究

李文中 020

大型语料库的合理使用与共建共享

梁茂成 022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从语料库中挖掘语言学与非语言学的知识

冯志伟 025

大型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库问题与对策

杨寿勋 049

学习者语料库与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

徐 海 056

基于用法的模型与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胡春雨 063

外语教学研究

外语教学三大情结与语言习得有效路径

王初明 073

探究我国高校外语教师互动发展的新模式

文秋芳 任庆梅 083

Effect of Task-inherent Production Modes on EFL Learners' Focus on Form

牛瑞英 094

中国语言习得研究三十年（1978—2008）

曾 涛 119

重铸研究综述

姜 琳 139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condary and University EFL Learners in Mainland China

麦晓萍 145

自我概念和目标倾向对英语说话焦虑的预测力

王家明 160

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的英语学习信念研究

朱秀全 168

一项新闻听力图式教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冯桂芳 180

词汇习得研究

- | | | |
|--------------------|---------|-----|
| 自然阅读中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 张 宪 亓鲁霞 | 191 |
| 二语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认知模式 | 邹启明 项 娜 | 202 |
| 词合作为 EFL 词汇习得单位的理据 | 张文忠 | 216 |

语言测试研究

- | | | |
|--------------------------------------|------|-----|
| 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 杨惠中等 | 228 |
| 做事测试信度和效度的 Rasch 模型分析 | 刘建达 | 243 |
| 大学英语校内测试命题质量分析 | 何国雄等 | 259 |

心理语言学研究

- | | | |
|-----------------------------|---------|-----|
| 口译中的语言转换心理机制：非对称有限并行加工模型 | 董燕萍 | 270 |
| 存储更多的中心词并不一定增大加工难度——来自汉语的证据 | 吴芙芸 | 282 |
| 填充停顿对二语学习者在线听力理解影响的研究报告 | 徐林荔 孙 蓝 | 291 |
| 通过翻译判断实验探索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双语词汇表征结构 | 胡敏燕 | 303 |

语言学理论及应用研究

- | | | |
|-----------------------|---------|-----|
| 人际冲突中有意冒犯性话语的语用分析 | 冉永平 杨 巍 | 318 |
| 基于转喻认知机制的语用推理研究 | 江晓红 | 330 |
| 再论“差不多”与“差一点” | 张庆文 | 340 |
| 基于音系理论的声调表征及变调算法研究 | 贺俊杰 | 363 |
| 律师代理词中介入资源的顺应性分析 | 胡锦芬 | 372 |
| 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构建——《政治语言学》述介 | 卢婷婷 | 383 |

桂诗春先生的治学之道

——贺诗春先生八十华诞*

胡壮麟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就我这一代解放初期培养的外语教学工作者而言,我总是把桂诗春先生看作学长、师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虽然我们在同一时间段读的大学,诗春先生毕竟长我三岁,但更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是我的楷模,一生功名,成绩斐然。他是我辈中少有的几个能与已故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先生并起并坐者。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我这里只能就感受较深的几点谈谈诗春先生的治学之道。

1. 一颗红心,三个突出

我先从高校中常见的提职称谈起。每当学校提教授、副教授等职称,我们总会碰到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有的教师科研很好,教学却不太认真负责。据说某所学校的某位教师排课时年年只肯上精读二,不愿意换新教材或上新课,也看不起只会上课而没有科研成果者,认为只有搞科研才能成名成家;有的教师只上课,甘当教书匠,不愿意搞科研,认为搞科研是雕虫小技,名利思想作怪;还有一些教师不愿意担任教学小组长、教研室主任、党团工作、学生工作或工会工作,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没有组织能力或者表示自己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为此,每当提职称时,北京大学反复强调,凡教学、科研、行政三方面突出者优先。

现在再来看看诗春先生的人生轨迹。他就是一个“三突出”的典范。

诗春先生1955年毕业后,即在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任助教,1960年任讲师,1979年任副教授。他兢兢业业地讲授各种语言课和文学课;改革开放后又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1993年获广东省“教书育人”南粤优秀教师特等奖,又被国家教委与国家人事部授予1993年度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995年在广东省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1996年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可见诗春先生在教学方面无疑是优秀的、突出的。

我们都知道诗春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委员

* 该文曾发表在《中国外语》2010年第5期。

会会长、广东外语学会会长等职。这都是他经过为党为人民服务多年的磨炼才趋于成熟，走上事业的高峰。例如，早在1960—1964年在教书同时，已兼任英语教研室副主任，1964—1970年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1974—1981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1984—1988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服从学校的工作需要，在广外干起教务工作，如1970—1972年在广州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工作，1972—1974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通过这些，我们不难发现诗春先生早就是一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热血青年。这种“党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党要干啥就干啥”的人生目标，今天也许有人不那么理解，但我们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都会同意诗春先生在工作中的表现是积极的、突出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诗春先生被国家人事局授予“有突出贡献国家级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诗春先生一贯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我用“一贯”二字在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有三篇文章发表，如“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奥德赛》主题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人·人情味·人性论”（《羊城晚报》1961年）。考虑到我国当时正处于狠批“白专道路”和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诗春先生能完成三篇大作殊不容易。在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诗春先生很快就能看清方向，抓住机遇，数十年来完成著作八部，论文数十篇。他在科研方面的突出成绩显然也是超凡的、突出的。诗春先生的才识在境外也受到肯定，1988年被日本神户女子大学授予名誉人文科学博士；1994年香港理工学院授予“杰出中国访问学人”奖。

诗春先生的突出业绩不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争光，为广东高校的外语界争光，也为我国外语界争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高校外语界及我国外语界为出现诗春先生这样一位大师而感到荣耀。

2. 基础扎实，语文并重

诗春先生之所以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如此显著成就，得益于他在求学期间和作为青年教员期间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的成长对我们如何提高自己、如何认识和做好英语专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谈语言和语言学。2010年5月20日，诗春先生曾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师生做了一个“什么是语言与语言学？”的专题学术讲座，诗春先生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指出认知科学和物理学、天体物理、分子生物学并称当代四大前沿学科，并从信息和语言的角度指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我们也知道，诗春先生早在1980年策划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应用语言学研究会，之后倡导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学科的研究。遗憾的

是很多年来高等教育界有些教师把英语语言文学这一专业中的“语言”仅仅看作是“听说读写”的技能教学，没有充分认识到指导“听说读写”教学的理论基础来自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有人曾经质疑外语专业学生学习语言学的必要性，并以外语学生不学语言学也可学好语言为借口进行辩解。这样，诗春先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回答了语言学习和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上述怀疑者最好研究一下诗春先生如何通过语言学的学习和实践才成为大师的。

诗春先生对语言学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文学教学的否定。他（1984:3）认为“文学教学和语言教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作家的作品既是艺术的创作，也是一篇语言的素材。语言学家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分析，不能离开作家的心绪、感受和他所创造的形象。同样的，文艺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分析，也不能离开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问题是使学生认识文学交际手段的性质和方法”。鉴于这个原因，话语分析和文体学应该是语言学与文学、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的结合点。诗春先生认为文学和语言学不可分家，并指出当代大学生的文学底子不够厚实的问题（2004c）。不是吗？诗春先生的功底之所以扎实的原因之一源于他的文学修养。

就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诗春先生语重心长地提出，“以语言为研究方向的同学应该多读些文学的东西，同样的学文学的同学也应该掌握一定的语言学知识”（2004c）。当今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或者听说读写教学挤了文学教学，使专业英语教学形同大学英语教学，或者文学教学挤了语言和语言学教学，使专业英语教学脱离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削弱了学生注重实际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 注重实际，追求创新

以上讨论表明，诗春先生重视理论，特别是语言学理论的学习。

值得称道的是，诗春先生以敏锐的眼光注意许多学科的发展。他总是扮演领跑者的角色，不愧为先知先觉者，对我国外语界的学科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分析他有关某些学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便可知其大概，如：

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现代外语》1978年第1期）
应用语言学	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光明日报》1978年11月9日）
词汇学	英语某些新词的产生及其社会背景（《现代外语》1978年第2期）
心理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 | | |
|---------|-------------------------------------|
| 语言测试 | 语言测验的测量和评估 (《现代英语研究》1981 年第 1 期) |
| 计算机辅助教学 | 电脑技术在外语教学和科研中的应用 (《外国语》1985 年第 4 期) |
| 认知语言学 | 认知与语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3 期) |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 诗春先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语言学而语言学, 他总是从外语教学的视角讨论语言学理论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他 1978 年至今的文章中至少有 20 多篇的内容是与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关的。还有许多文章的内容涉及语言测试和计算机语料库, 而他的 8 部专著和论文集无不与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有关, 如《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标准化考试——理论、原则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等等。

诗春先生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呢? 我们不妨读一下他对应用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的评述。就应用语言学来说, 他 (2004b: 5) 认为该项研究有广阔天地, 如中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汉语的许多变量和参数至今还是个空白点; 应强调以过程为中心, 应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各种应用语言学课题, 使应用语言学成为文理结合的一个新领域。他认为应用语言学的认知基础将会受到进一步的重视, 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神经网络模型对探索语言使用和学习过程将会有很大的启发。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 它的研究成果对提高我国语言教学的质量有直接关系, 它将加速培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大量外语人才。

再具体说, 除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外, 诗春先生 1982 年便是我国教育部“英语水平测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PT) 命题小组的负责人, 为测量和评估我国学生, 特别是派遣到说英语国家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英语水平, 提供了选拔的依据。在 EPT 的影响下, 国家人事部和外国专家局相继出台了“出国人员考试”和 BFT 考试。在某种意义上, 它也为日后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积累了经验。

4. 观点明确, 仗理直言

当我们回顾和评估中国外语教育 60 年或 30 年时, 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理据,起码它告示中国外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观点中,诗春先生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讨论不是口号式的,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的。

先从中国孩子接受外语教学的起始年限谈起。受乔姆斯基儿童学习语言的“临界期”理论的影响,国内盛行“学英语越早越好”的观点。于是,有主张将初中开设外语课改为小学五年级开设的,有主张小学三年级开设的,还有小学一年级,甚至在幼儿园开设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料,在人们认为本来是一个答案非常明确、非常简单的命题时,诗春先生能从语言规划的高度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就是学得早并不总是学得好。在这个基础上,诗春先生(1992; 2005: 5)提出要树立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态度。例如,通过对比研究来了解:(1)在相同的条件(包括教学资源、培养目标、学习动机等等)下,我国儿童学外语是否优于成人?(2)小学三年级是否为我国教授外语的最佳年龄?(3)在普通教育里,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达到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要求?(4)外语学习对别的学科的学习有没有影响?(5)每提早一个年龄段教外语,我们需要多少教育资源的投入?总之,决定学外语的起始时间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因此我在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北京市民讲英语的有关活动时经常引用桂老的这些观点,希望领导和与会者全面考虑所讨论的问题。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几个教学大纲,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的、基础教育的,都以最时尚的交际教学法为纲。诗春先生敢于指出交际教学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他认为“交际法”教学在入门阶段还可以,但到中级、高级阶段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主要原因是这个教法的内涵太少。交际不是不需要,但关键是能否达到交际目的。当时搞这个教法的人很高兴,看到学生叽里呱啦地讲了许多英语就高兴得不得了。学生原来不爱讲英语,现在开始开口讲话了。但大家说,这有什么意思?满嘴都是错话。他们有借口:让他们讲下去,他们慢慢地自己会讲正确的。可是一直讲下去就会总说错话,就是‘洋泾浜’英语。”因此对外语专业的学生采用交际法两年即可(包天仁 2004: 19)。

80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外语只是工具,不是专业”的言论。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有位少年得志的校领导曾建议取消外语专业。他的观点对不对?我们不妨从诗春先生对这类现象的评论得到启发:他(2004b)说:“我们往往把社会需要和办教育直接挂钩,按毕业生就业情况来考虑办什么专业。人才的教育周期性很长,人才的培养要减少盲目性,必须加强科学的预测性,而不是看一两年的需要。”他进一步指出“外语是一门战略性的学科,为了和苏联争夺宇航权,上一个世纪的50至60年代,美国的国防教育法案把外语作为国防性教育的三门重

要学科之一”。后来美国总统 Eisenhauer 专就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发表过国情咨文。在一部分领导和教师鼓吹“外语+专业”的道路时,诗春先生冷静地指出“我们容易把职业和专业混为一谈。专业是一种学科体系,我们国家也制订了学科目录,有一、二、三级学科。学科有一支专业队伍支持,有不同层次的学位。有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对比之下,那些热衷于把高校的英语专业降格为职业学校者的思想境界不够开阔。诗春先生还指出:“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有需要,就不问学校层次,一窝蜂地去办,特别是建立一个专业应该经过论证,不能不问条件,否则名不副实,降低学校的声誉。”我认为诗春先生在这里吐露的真是肺腑之言。外语界需要这样看得高、看得远的大师!

再来谈谈听说与读写的关系。本世纪初,人们对大学英语 1999 年的教学大纲提出质疑,认为该大纲强调读写,不重视听说是一个重大失误,是我国外语教育“费时低效”和“聋哑英语”的罪魁祸首。正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诗春先生(2005)挺身而出,说:“据我所知,全世界英语教育界在 100 年前就讲‘加强听说’,这个问题如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现在为什么还在谈?就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是规律。”接着,他指出解决问题之所在,那就是创造学习和应用外语的环境,“没有英语语言环境,听说能力很难提高”。

诗春先生在退休前后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若干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整理专业目录时,曾试图将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取消,合并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这样做不能区分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不同需求和重点。我们正在焦急万分、束手无策之际,是诗春先生不辞劳苦,到处奔走,向领导反映情况,最后将国外语言学和和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点保留了下来。

诗春先生(2004a)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存在不少误区,其原因在于有的领导者没有把外语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往往根据一些“常识”来进行决策。这意味着对外语教育改革要尊重客观规律,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来武装我国外语教师;另一方面,对外语教育改革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对外语教育科学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5. 老骥伏枥,退而不休

2009 年,《中国外语》的编者希望诗春先生在纪念她创刊 5 周年的刊物上写几句话,诗春先生就 Bernard Spolsky《二语学习的条件》一书写了“一个大题目”一文,言简意赅。他把 Spolsky 提出的一个题目:谁在什么条件下学习哪种语言,学多少语言?(Who learns how much of what languages under what conditions?)分解为 4 个问题:(1)在什么条件下学外语?(2)学哪一种外语?(3)学多

少外语? (4) 谁在学? 这篇短文的亮点在于诗春先生告示我们: 首先, “外语教学和治病救人、绘制基因图谱、制造火箭、编制计算机程序等一样, 都是一门科学, 有其自身的规律, 值得我们去进行科学探究, 有所发现, 有所前进。” 其次, Spolsky 的这本书是他 20 年思考的结果, 告示我们外语教学中的问题不能急功近利,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诗春先生 (2010) 的这些思想在他最新发表的“应用语言学思想: 缘起、变化和发展”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 诗春先生早在 1980 年就组织召开全国应用语言学会议, 至今已 30 年, 显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变化和发展”。为此, 诗春先生为我们梳理了 1964 年以来应用语言学 (AL) 如何从外语教学和自动翻译两个小组发展到今天相对稳定的 25 个科学委员会。对于这一“不断的延伸”过程, 诗春先生给了我们精湛的回答, 那就是除了现实的需要外, “这和语言的本质分不开: 语言是人类的属性之一, 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语言”。他用 Cook & Seidlhofer (转引自 2010: 166) 的话解释说: “它可以是基因遗传、数学模型、社会事实、个人认同的表达、文化认同的表达、会话交往的结果、社会符号系统、本族语者的自觉、验证数据的总和、记忆块件的集合、受规则支配的离散集合系统, 或是分布式网络中的电子集合。”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已经谈到的情况足以说明诗春先生宝刀未老, 虽已八十高龄, 还在看书, 活到老, 学到老; 也告诉我们, 他还在思考, 还在关注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 还在寻找和回答人类赖以生存的语言问题。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人们也许会发问, 你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 身体也不好, 老远跑广州干什么? 我的回答是, 向诗春先生学习, 让我们更好地学习诗春先生的治学精神, 更多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祝诗春先生高寿!

参考文献

- [1] Spolsky, B. (1988).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包天仁. (2004). 桂诗春教授访谈录.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 19—21.
- [3] 桂诗春. (1982). EPT——一种标准性、客观性的英语水平测验.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66—72.
- [4] 桂诗春. (1984).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外国语》, (4), 1—6.
- [5] 桂诗春. (1992). “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52—54.

- [6] 桂诗春. (1994). 应用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93—94.
- [7] 桂诗春. (2004a). 我国外语教育的根本出路. 《中国外语》, (1), 10—13.
- [8] 桂诗春. (2004b). 我国外语教学的新思考. 《外国语》, (4), 2—9.
- [9] 桂诗春. (2004c). 对怎样办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几点看法. 桂诗春先生在首届外语院校英语学院联席会议做的主题报告.
- [10] 桂诗春. (2005). 谈当前的外语教学. 《中国外语》, (2), 5—8.
- [11] 桂诗春. (2009). 一个大题目. 《中国外语》, (5), 4.
- [12] 桂诗春. (2010). 应用语言学思想: 缘起、变化和发展. 《外语教学与研究》, (3), 163—169.

高层论坛： 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 该系列稿曾发表在《现代外语》2010年第4期。